

新中国成立后党加强对科学事业 领导的实现过程^{*}

——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的考察

向 明

提要:建国后,加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中国科学院是发展科学事业的中坚力量,建院初期,相对于院行政领导集体的显赫地位,院党组成员的社会影响力明显较弱,难以实现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因此,中央不断通过外调高级别行政干部充实中国科学院党组,张稼夫和张劲夫先后担任党组书记。通过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党的会议制度,落实秘书长制度等系列举措,逐步实现了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

关键词: 党的领导 中国科学院 张稼夫 张劲夫

作者向明,女,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 101408)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17.01.018

在“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下,各党各派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政权。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将一些中央政府所辖部门的行政领导权交予了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但是从长远考虑,中央在政务院下辖各部门大多设置了党组。此后,加强各部门的党组力量从而实现党的全面领导成为了党中央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科学院是新政权的一个重要部门,党组的设置自然不可避免。早在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之前,中央就让恽子强、丁瓚等党的领导干部负责整合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研究力量和资源,为科学院的正式成立筹备布局。科学院成立以后,此二人分别被任命为院党组书记和副书记。建院之初,科学院的党组是没有对外公开的,党组成员很少且不固定。据樊洪业考证:“中国科学院党组成立于1949年11月,首任党组书记恽子强,副书记丁瓚,任期至1952年底。初期院党组成员先后有恽子强,丁瓚,汪志华,严希纯,孙桐,吴征镒,李亚农,范文澜,关肇直,曹日昌,刘大年,张克明,秦力生”。^①其中前五位是1949年的党组成员,李亚农、范文澜、关肇直和曹日昌是1950年加入的党组成员,刘大年和张克明是1951年加入的,秦力生是1952年加入的。相比于中央给科学院配置的行政领导而言(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

* 本文是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郭沫若与中国科学院》(2015SJB8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樊洪业:《陈伯达“被书记”始末——建院初期院党组史实辨正》,《院史资料与研究》2012年第1期,第28页。

和、竺可桢、吴有训、办公厅主任严济慈)，党组成员的综合影响力远不及行政领导集体。面对这样一种格局，如何在中国科学院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一重要问题同样也存在于其他政府部门。由于建国后的档案资料很多没有公开，学界对建国后中央政府各部门如何加强党的领导的研究非常薄弱，具体到中国科学院党的领导加强过程的研究，也只是分布在回忆录、日记、人物传记以及口述史访谈等资料中，零散且不成系统。本文将对这一问题做系统的考察，以求教于学界。

—

早期的中国科学院，是政务院下辖的一个部门，院长内定为郭沫若，党组书记为恽子强。郭沫若是中共秘密党员，建国后被委以重任，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及文教委员会主任。由他来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央自有深意。首先，郭沫若虽然是中共秘密党员，但公开身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内定他为院长正好符合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其次，中国科学院是学术人才集中地，按照常理，院长必须在学术方面有一定的造诣方可服众。郭沫若当选过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力；最后，以恽子强为书记的科学院党组力量薄弱，中央需要一位跟党靠拢的院长来贯彻执行党的科学方针。由此可见，由郭沫若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是党中央最合适的安排。龚育之分析：“共产党来领导新中国科学的时候，郭沫若恐怕是一个很自然的人选。尽管郭沫若最有影响的是文学，是政治言论，但是共产党需要一个跟党很靠拢的、实际上是秘密共产党员的人，而且连国民党都承认他为院士的人。郭沫若当院长，与这个背景不无关系”。^①除郭沫若外，科学院还配备了几位在科学界颇有威望的领导，如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严济慈等。

相对于院行政领导集体的显赫地位，院党组成员的社会影响力明显较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党内选出一位有深厚学术功底、革命干部是一件困难的事，理想人选的标准是：学术地位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属于一个量级，在党内有较高的地位。显然，找不到这样的人选。因此，恽子强被选为党组书记，^②仅是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相对理想人选。恽子强有丰富的革命经历、较丰富的科学管理经验和一定的科研素养，但称不上是科学家。他早年在苏北新四军军部工作，创办过医学院，筹办过制药厂。由于工作需要于1943年1月启程赴延安，“1944年6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改由原军工局长李强任院长，恽子强任副院长”。^③在延安，像恽子强这样受过系统科学训练的干部很少。后根据组织安排，调到华北大学工学院，担任副院长。从他的经历来看，恽子强是一位党性修养很高的科学战线上的领导干部，每一次都坚决服从党的安排。除了担任党组书记，恽子强还兼任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编译局副局长等职。建院之初，虽然他是党组书记，但是其在科学界没有深厚的影响，“兼任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的角色意味着他和副院长之间差距较大，领导科学家对其来说也是不可及的。

除恽子强外，中央还选定了一位党组副书记：丁瓚。丁瓚是心理学家，在科学界的影响力高于恽子强，但是科学造诣远不及其他几位副院长。他虽是中共党员，但缺少延安经历。因为长期在国统区工作，和国统区的科学家关系密切。中宣部长陆定一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时，就安排丁瓚做具体工作。同恽子强一样，领导科学家对其来说也不可及，但是在科学家和党组织之间，他是重要的桥梁，因

^① 龚育之：《龚育之自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

^② 在现有的众多研究成果中，多提到陈伯达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党组书记。此时的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领导班子中仅是挂名，中国科学院的行政事务和党务，他的参与微乎其微。樊洪业的《陈伯达“被书记”始末——建院初期院党组史实辨正》一文，对此问题进行了详实考证，具有说服力。

^③ 安其春：《恽子强同志生平》，《院史资料与研究》1998年第1期，第51页。

此,有一定的影响力。

除以上二人之外,还有其他几位党组成员,他们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和院部机关。范文澜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地位,此时担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吴征镒此时任植物分类研究所副所长;李亚农此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刘大年是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曹日昌长期在海外从事地下党工作,推动海外留学生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后担任计划局副局长;关肇直从海外留学归来,此时参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筹建工作,担任图书管理处处长;严希纯担任行政处处长;孙桐担任人事处副处长;汪志华担任秘书处副处长;张克明是秘书处秘书。上述成员,从学术影响和党内地位两个层面分析,除了范文澜,其他成员的影响力均是有限的,其综合影响力远不及中国科学院行政领导班子。

加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是中共政权的一个既定方针。但是建院初期,党组做不到对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一是因为科学界不同于其他领域,选拔合适的党员干部存在较大困难。二是因为“中共一方面尊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府机构中遍设党组;另一方面须践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以统战策略维护按《共同纲领》与党外民主人士协商执政的外观格局,在决策和操作层面起实质性领导作用的党组暂时处于隐蔽状态。1953年之前,中国科学院党组活动不仅未见于公开宣传,也未见于内部档案的记载,甚至由基层人事部门负责管理的档案中,身为党组成员的个人履历中也不得显示这一记录”。^①

面对上述状况,调整充实中国科学院党组是必然的。出于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和对科学家的尊重,中央还是尽可能调配有科学文化背景的管理干部。但是找出同副院长影响力相匹配的党员干部客观存在困难。那么如何充实党组力量呢?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是外调高级别的行政干部来充实中国科学院党组;二是在科学家中发展党员。前者是最直接的方式,秦力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了中国科学院。1952年初,因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严济慈奉命前往东北组建东北分院,办公厅主任一职空出。1952年9月,时任西康省委副书记的秦力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在充分考虑了秦力生多年的实际工作业绩及工作作风之后,组织部决定派他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任办公厅主任,并为院党组成员”。^②秦力生来到中国科学院的行政职务是办公厅主任,这一配置打破了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党组领导担任办公厅副主任的上限。秦力生的加入充实了党组力量,但是在科学院内还是做不到“有效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在中国科学院内部重大决策和重大活动组织的过程中,党组成员追随行政领导集体的局面没有根本变化。

二

1953年1月14日,中央任命张稼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稼夫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有较丰富的革命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西北局常委等职。^③张稼夫刚到中国科学院不久,就参加了访苏科学代表团的组建工作。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参加代表团,并担任代表团党支部书记,回国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忙于以党组名义向中央递交《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不同于恽子强,张稼夫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是科学院副院长,因此重大场合,他能代表领导班子出现,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党组领导的加强。

① 樊洪业:《陈伯达“被书记”始末——建院初期院党组史实辨正》,《院史资料与研究》2012年第1期,第2页。

② 王忠俊:《秦力生》,余志华主编:《中国科学院早期领导人物传》,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43页。

③ 庞真:《张稼夫》,余志华主编:《中国科学院早期领导人物传》,第83页。

1956年,“大约在当年三四月间,张稼夫因病住院”,^①经诊断为“疲劳症候群”,并患有“进行性的大脑动脉硬化”,医生建议其疗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决定调离张稼夫。

1953年4月10日,政务院任命郁文为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党组成员。郁文长期战斗在新闻宣传战线,西安解放后,他被调任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调任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张稼夫是西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属于郁文的老领导。可以说,中央调郁文来中国科学院,既是充实中国科学院党组力量,也是为了配合张稼夫开展工作。郁文上任后,主要分管人事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1954年设立人事局,他任局长。1956年任副秘书长,继续分管政治工作、人事教育和党务工作。

从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上半年,秦力生、张稼夫和郁文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院党组力量得到了一定的充实。从1953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隐蔽的党组进入了公众视野。1953年4月14日,当张稼夫尚在出访苏联期间,中国科学院召开了首届党支部大会,据竺可桢日记记载:“主席团有关肇直、李明哲、周志成、彭庆昭、沈云、恽子强、王荣俊、胡雨人、范文澜、张克明、郁文、秦力生、张庆林等十三人。秦力生做主席报告。1950年党员五人。1951年成立支部,党员十三人。去年七月党员56人,现有167人”。^②秦力生的报告简要概述了建院以来党员人数的增加过程,也是中国科学院党组织壮大的直接反应,此次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张稼夫参加访苏代表团回国后,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在苏联科学院也是一个不断增强的过程,“当时苏联科学院中也没有党的组织,只有一个共产党员是扫院子的工人(现在是生理研究所的行政副所长),党只有通过比较进步的科学家领导科学院的工作。现任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以前的院长都不是共产党员,直至一九二四——二六年才开始在科学院中建立党的支部”。^③张稼夫上任后,先是熟悉工作、适应工作,接下来开始着手推进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有如下几个重要举措:

首先,调配党员干部充实研究所。1953年11月,张稼夫上任不久,即以中国科学院党组名义给中央打报告,提出“请中央调给科学院20个相当于司局级或地委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充任研究所的行政副所长,以加强党的领导”。^④当然,一次调配20位党员干部来院工作是一件困难的事。1954年3月4日,张稼夫致函中央,就干部调配再次做了请求。中央领导3月8日回复:“稼夫同志:科学院局司级干部配备,已经中宣部务会议讨论通过,但尚须等候中央批准,始可正式任命”。^⑤这段材料清晰地反应出,中央对张稼夫的请求是支持的。主管科学工作的陈毅面对张稼夫的请求,“说你这一个摊子比一个方面军还难搞,我给你从复转军人中找些干部吧,后来果然调来了一批”。^⑥但是调配的速度和人数都没有达到张稼夫的预期。因此,直到他离任前,还在向中央呼吁,调配党员干部充实研究所队伍,“我们现在还有许多所是由人事干部或办公室副主任进行党的工作,今后除由我们设法在现有党员中培养和提拔外,尚望中央和各地方党委给以大力支援”。^⑦

其次,召开人事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建院伊始,人事工作隶属于办公厅,人事部门仅是处级建制。张稼夫上任后,中国科学院于1954年成立了人事局。在人事局组建的前提下,中国科学院党组于1954年9月15日至30日召开了第一届人事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京、东北和华东各单位党

① 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65页。

② 《竺可桢1953年4月14日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3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1—112页。

③ 《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3年)》,中国科学院内部出版,1996年。

④ 苏世生等:《郁文》,余志华主编:《中国科学院早期领导人物传》,第390页。

⑤ 《3月4日汇要》,《中国科学院史事会要(1954年)》,中国科学院内部出版,1996年。

⑥ 张稼夫:《庚申忆逝》,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3页。

⑦ 张稼夫:《中国科学院在中央召开的知识份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要点》,《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6年)》,中国科学院内部出版,1999年。

员干部 148 人。张稼夫在会上作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在科学工作中的政策》的报告,对党领导科学事业进行了阐述。这次会议按照中央的指示,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了分析。“由于当时党的工作大多依托在人事部门,党员骨干多数分布在人事系统,因而行政上称这次会议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次人事工作会议,党内则称为党的工作会议”。^①继 1953 年 4 月,中国科学院召开首次党支部会议,1954 年 9 月又召开第一届人事工作会议,党的工作会议的模式开始成型,这是加强党的领导的结果,也是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的起点。

最后,组织召开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1955 年 1 月 17 日中央批准中科院党组由 7 人组成,由张稼夫首先在中科院党组宣布:“近年一月十七日中央讨论通过中国科学院党组名单,这个名单中除我之外,还有潘梓年、陈康白、武衡、秦力生、尹达等六人”。^②

在此基础上,按照中央的要求,1955 年 3 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郭沫若应邀出席,并讲了如下的话:“科学院在 1952 年以前,党的核心力量很弱。自从 1952 年底稼夫和力生等同志加入之后,确实和过去不同,这证明党的力量加强工作即有所改进,如能更进一步的加强,就会有更进一步的改进,此次党组扩大会议,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党员干部之间更加团结了。这将会加强党组的领导,但我对加强科学院党的领导还有两点建议,一是请中央派一位更高级的、真正有领导能力的同志担任院长职务,只有如此,才可以和政府有关各部有机联系,也可以统筹规划科学工作,我在这里不是说客气话,让我多学两篇文章比当两三年院长更有好处。请陈毅同志把这个意见向中央转达一下,不然,我见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是要提的。请中央不要把我当成统战对象看待。让我领导科学院的工作,确实值得考虑。”^③

郭沫若在讲话中提到 1952 年之前,中国科学院党组力量很弱。张稼夫和秦力生来了后,确实与过去不同,有所改进,此评价较为客观。总之,张稼夫时期,通过上述举措,给外界的直观感受是,中国科学院党的领导正日益加强。

按照中央的要求,此次党组会议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中科院的党组工作进行深入反思。在小范围内,张稼夫进行了自我批评:“大家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我做为一个班长,也不满意”。^④张稼夫提到的“大家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是普遍存在的,从会上党组成员发言来看,党组内部确实存在矛盾,矛头多指向了张稼夫工作随意性较强,大事管的少,小事管的多。秦力生在发言中说:“稼夫同志的工作作风,是对小事抓的紧,大事他又不大管。”^⑤

对于中国科学院党组内出现的这些现象,中央是了解的也是不满的。更让中央不能接受的是,这段时间有人提出请中央撤换中国科学院院长。在党组会上,“陈老总动情地说,郭老是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合适人选。你们要撤换郭院长,你们自己去向中央反映,但是,你们在反映时必须加上一句,我陈毅不同意”。^⑥想必上述言论也传到了郭沫若耳中,这也是郭沫若在发言中提出自己想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重要动因。

综合上述原因,中央觉得张稼夫缺乏协调党政的能力,也缺乏协调党组成员之间关系的能力。显然,由张稼夫继续担任党组书记已不合适,于是党组扩大会议之后不久,中央决定调离张稼夫,调入张劲夫。张稼夫之所以被调离,身体不好是直接原因,但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央觉得从领导能力来说,他

① 苏世生等:《郁文》,余志华主编:《中国科学院早期领导人物传》,第 386 页。

② 《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院档 1955-01-001-03,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

③ 《郭沫若院长在中国科学院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院档 1955-01-001-04,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

④ 《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张稼夫发言》,院档 1955-01-001-03,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

⑤ 《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秦力生发言》,院档 1955-01-001-03,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

⑥ 薛攀攀:《不曾想走的路:我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 年第 4 期,第 311-312 页。

已不是领导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合适人选。据于光远回忆：“我国的科学工作规模逐渐扩大，地位也日渐提高，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给管起来。张稼夫是位很好的老同志，只是能力显得弱些”。^① 这样的评论恰如其分。

三

1956年中央知识分子会议提出“向科学进军”后，中央决定进一步充实中国科学院党组。1月份会议刚结束，2月份就开始了人事调动，张劲夫、裴丽生、杜润生在这时调来中国科学院，组成了新的党组。此轮人事调整，也是在陈毅的主导下进行的，“增加了张劲夫，调出张稼夫，然后成立一个秘书长队伍，这是陈毅同志出的主意”。^② 建立秘书长制度不仅是为了加强中国科学院党的领导，更是推进实现党组集体领导。

1956年2月20日，由郭沫若向院内宣布人事调整，当天，竺可桢日记记载：“下午三点，郭院长公布科学院人事方面的变动：张稼夫副院长调二办为副主任，由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张劲夫为副院长。同时以山西省长裴丽生为秘书长，农村工作部杜润生做科学规划”。^③ 此次人事调整力度很大，对中国科学院党组是一个极大的充实。

张劲夫于1956年3月9日正式上任。他是一位受过系统高等教育训练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跟随陈毅，新中国成立后，先在浙江省主管财经工作，1952年秋调任华东局财委副主任，后被中央调任地方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从《张劲夫访谈录》一文来看，调张劲夫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是陈毅的提议，中央做的决定，中组部长安子文做的通知。张劲夫跟随陈毅多年，此时主管科学工作的陈毅调张劲夫来中国科学院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裴丽生随张劲夫一起来到中国科学院，被任命为党组副书记，行政上先任秘书长，后任副院长。他也是一位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太原解放后，裴丽生担任市长，后逐步升任山西省省长。从现有资料来看，他是张劲夫的得力助手，在后来国家重大科学专项工作中，多有裴丽生的身影。

杜润生也是随张劲夫一起来到中国科学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他本身就是一名学者，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被毛泽东主席批评为“像小脚女人走路”而降职来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到院后，他首要工作是参加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制定。规划制定接近尾声之时，杜润生申请调到地方工作，没有成行。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留下杜润生以及重用杜润生，都和张劲夫有密切的关系。张劲夫之所以有这样的思考，出发点是加强党的领导，在党组内形成一体两翼的领导核心。据张劲夫回忆：“我说，裴丽生也很好，他是一位老同志了，做实际工作很努力，很认真负责，埋头苦干，这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但是，在科学院工作只有这个助手，我工作还做不好，我还需要一个助手，就是有理论水平、有见解的同志。因此，我建议把裴丽生同志也作为副院长，杜润生同志就作为秘书长。”^④

张劲夫上任时，中国科学院党员数量以及党组的领导力较张稼夫上任之初已有很大改观，这为张劲夫在中国科学院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打下了坚实基础。张劲夫上任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岗位，为加强党的领导，张劲夫采用了以下几项重要举措：

首先，落实秘书长制度。上任后不久，1956年5月18日，张劲夫主持召开院党组会议，报告了年

^① 《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26页。

^② 李真真、韩宁：《吴明瑜访谈录》，《院史资料与研究》1996年第2期，第13—14页。

^③ 《竺可桢1956年2月20日日记》，《竺可桢全集》第1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93—294页。

^④ 刘振坤：《在科学院辉煌的背后——张劲夫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8页。

内改进科学院党组领导工作的全面设想和步骤安排,重点是落实秘书长制度。张劲夫在报告中指出:“院部组织这是领导核心,应考虑迫切重大问题,秘书长制度从总的精神上讲是学术行政一致,而不是并列。须增设副秘书长,明确秘书长和院务会议的关系,既明确后,经常的工作和组织工作秘书长就应多考虑多准备,帮助院务会议解决问题”。^①

张劲夫的全面设想,旨在突出秘书长的作用。“明确秘书长和院务会议的关系”,为加强党的领导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切入点。这样一来,裴丽生的角色在中国科学院就显得格外重要,从后续实践来看,有担任省长经历的他有能力肩负这个角色。张劲夫全面突出裴丽生秘书长的地位,旨在希望其把中国科学院的行政事务抓起来,自己也能从繁忙的行政事务中抽身。

秘书长制度落实后,张劲夫加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有了重要抓手。院党组逐渐成为中国科学院的行政枢纽,反之,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委员会的召开逐年减少,郭沫若参加此类会议次数也呈递减趋势。据统计,1956年全年共召开38次院务常务会议,郭沫若出席29次,1957年全年共召开21次院务常务会议,郭沫若出席11次,1958年全年共召开13次院务常务会议,郭沫若出席2次。在院务常务会议日益减少的同时,党组会议主导中科院重大决策的局面开始形成。

其次,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张劲夫上任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在每年年底或次年初召开一次党组扩大会议。旨在全面改善党组织涣散的局面,突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会议主要“吸收各分院和研究所的党领导人参加,总结当年或上一年的工作,部署和讨论研究全院和研究所的各项重大事宜,做出结论后就回去传达和贯彻落实,使党组织上下的意见得以顺畅贯通,遇到问题也能及时解决。从此,党组织涣散的局面得到显著改观,显示出党领导核心的作用”。^②上任后,张劲夫也多次打报告给中央,要求调配党员干部充实中国科学院。1957年2月17日,院党组呈请中央为科学院配备党员领导干部89人,中央给予了一定的支持。1957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从中央十二个部委抽调20名司局级党员干部到有关研究所工作,以加强党的领导力量。^③这与中国科学院党组的请求尚存在一定差距,于是,张劲夫常以党组名义致函中宣部、中组部,请求调配干部。中央对中国科学院的请求,虽不是一步到位的满足,但也是高度重视,积极支持,中国科学院的党员干部队伍不断得到充实。

最后,加强与中央和主要领导的沟通。张劲夫上任前,中国科学院党组与中央及主要领导人的沟通多经过中宣部,张劲夫上任后,以党组的名义与中央以及主要领导的沟通明显增多。据龚育之回忆:“自从张劲夫、裴丽生、杜润生来了以后,整个科学院事业规模大了,任务重了,领导强了。很多重大问题中央就直接找科学院党组,找张劲夫这些人,基本上不经过中宣部了”。^④龚育之此言恰当公允,有很多例子可以佐证,1958年10月,中国科学院举办“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为使中央领导了解科学院情况,张劲夫委托胡乔木妻子、时任中科院新技术局局长的谷羽去请中央领导。经过谷羽努力,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观了展览会,包括毛泽东也到场参观并接见了科学家。张劲夫请来毛泽东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既是为了让中央领导了解中国科学院情况,也是为了树立中国科学院的形象,更好地充当“科学火车头”的角色。“张劲夫曾抱怨说:科学院的婆婆太多,不好办事。国家科委、经委、计委、建委、财政部,等等,哪一关都可以把你卡住。要想办法通天,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支持,就好办了。1958年,终于请毛主席来院视察,直接向他汇报情况”。^⑤

① 《五月十八日党组会议纪要》,院档 1956-1-8,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

② 宋振能:《中国科学院院史拾零》,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42页。

③ 《10月19日汇要》,《中国科学院院史事汇要(1957年)》,中国科学院内部出版,1998年。

④ 龚育之:《龚育之自述》,第175页。

⑤ 张明远:《曲折岁月(1955.2-1979.10)》,《院史资料与研究》2003年第4期,第9页。

张劲夫上任后,通过上述举措,党的领导在中国科学院得到全面加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党组领导科学发展战略制定的局面形成。既往,中国科学院的重大发展战略,多是由院长、副院长牵头制定。到了张劲夫时代,局面发生改变。例如《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完成后,张劲夫带着规划向周总理汇报,总理提出,这么多重点,国务院应该主要抓哪些?张劲夫“当机立断决定趁着参加规划的科学家还没有离开北京,又召集他们研究这个问题。……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这些是重中之重,要摆在其他重点任务的前面来抓,就叫‘紧急措施’。‘四项紧急措施’因此得名”。^①从上述材料,可见张劲夫的魄力,“当机立断”召集科学家研讨四项紧急任务,是党组实现对科学发展战略制定领导的直观表现。

其次,党组领导科学管理政策制定的局面形成。既往,中国科学院的科学管理政策,主要也是由院行政领导班子牵头制定,张劲夫上任后,发生了变化。例如1960年11月底,张劲夫决定由杜润生主持,为扭转大跃进以来的科研局面拟定政策、起草条例。杜润生圆满完成了任务,提出了“对当前科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初稿有15条,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京区所长和党员副所长会议,经过讨论修订为14条。1961年4月初,张劲夫向分管科学的聂荣臻副总理汇报,这就是《科研十四条》出台的大概过程。紧接着,党组又制定了更加细化的、具体指导科学院工作的《三十六条》和《七十二条》。显然,党组领导科学管理政策制定的局面已经形成。

最后,科学家向往加入党组织局面形成。1956年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必须纠正过去很少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关门主义倾向。要求各级党委作出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的计划”。^②值此机会,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和一些科学家纷纷要求加入党组织,如郭沫若、李四光和钱学森,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召开了专门会议,“会议听取了郁文同志介绍了郭沫若、李四光、钱学森三同志入党问题的情况。一致同意接受这三个同志入党。其中郭沫若同志是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李四光同志候补期半年;钱学森同志候补期一年”。^③加入共产党后,1960年4月,郭沫若被批准进入中国科学院党组,院党组宣布,“经中央批准,郭沫若为科学院党组成员,杜润生为党组副书记;裴丽生为副院长,杜润生为科学院秘书长”。^④上述局面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科学院权力天平向党组一端倾斜的直接体现。

结 语

科学家和科学研究人员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加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是摆在中央面前的一件大事。在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国科学院,中央一方面通过外调高级别行政干部来充实中国科学院党组,另一方面通过在科学家中大力发展党员来壮大党组织力量。自1952年底中央派秦力生到中国科学院任职拉开了加强党的领导序幕后,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科学院院长、副院长和众多科学家纷纷要求入党局面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科学院已经实现了党对科学事业的系统领导。

责任编辑:任宜敏

^① 刘振坤:《张劲夫》,余志华主编:《中国科学院早期领导人物传》,第115页。

^② 巴延年:《王仲良同志与上海分院党的建设》,《院史资料与研究》1998年第4期,第51页。

^③ 《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第二次会议纪要》,院档1958-6-9,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

^④ 《中国科学院党组文件》,院档1960-1-1,中国科学院档案馆馆藏。